

越境的寓言： 《情人》和《上海宝贝》中的异国恋解读

杨 玲

提要： 本文将对杜拉斯的《情人》和卫慧的《上海宝贝》作一个比较性阅读。在笔者看来，两个文本都是描述异国恋的女性自传体叙述，都是关于边境和越境的寓言。但《情人》里的白种女孩和黄种男人的恋情被杜拉斯描绘为殖民者朝“下”的僭越，《上海宝贝》里的倪可和德国情人的性爱纠葛则被卫慧再现为被殖民者朝“上”的僭越。两位女主人公的种族身份差异不仅导致了文本中不同的权力关系组合，还带来了截然不同的阅读效果。通过对这些迥异的文本风景和读者反应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省察父权制度在建构和控制女性生活边境方面的操作手段，以及当今第三世界女性所面临的深刻困境。

关键词： 异国恋 边境 越境 第三世界女性

作者杨玲，女，1972年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专业2006级博士生。（北京100037）

1,950 mile- long open wound
dividing a *pueblo*, a culture,
ruming down the length of my body,
staking fence rods in my flesh,
splits me splits me
me raja me raja

This is my home
this thin edge of
barbwire.

—Gloria Anzaldua

以上的两节诗引自生长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女性主义作家格洛丽亚·安藻杜的《边境地带》。^①安藻杜说“美-墨边境是一个暴露的伤口，是第三世界刮擦第一世界而流血的地方。……边境的建立是为了界定安全和不安全地带，区分我们和他们”。不仅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边境，“在两个或更多的文化相遇的地方，在不同种族的人占据着同样领土的地方，在底层、下层、中层和上层阶级接触的地方，在两个个体之间的距离因亲密而缩短的地方”也都存在着边境。^②本文所探讨的《情人》和《上海宝贝》就是两个有关生活在边境的女

^① [美] Gloria Anzaldu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1987, pp. 2-3. 该段的汉语翻译是：“一千九百里长暴露的伤口/分割了一个村落，一个文化，/划过我的全身，/栅栏钉进我的血肉，/撕裂了我 撕裂了我/切开了我 切开了我/这是我的家/铁蒺藜/尖细的棱角”。诗中的斜体部分为西班牙语。在书写生活在边境的感受时，安藻杜将她的文本也变成了一个边境地带，其中英语和西班牙语混杂，诗歌和散文交织，白种文化和以印第安文化为主体的墨西哥文化共治一炉。有关“在边境”、“越境”等女性书写母题，还可参阅莉迪亚·库尔提的《书写妇女，书写身体——批评理论中妇女的声音》一文（刘兰芝译，《文化研究》第二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07-117页）。该文不仅提到了Anzaldua，还列举了世界各地与Anzaldua有类似经历的女性作家。

^② [美] Gloria Anzaldu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1987, p. 3.

性寓言。其中的女主人公都可以算是打破了常规和禁忌的越境者。她们被跨国情爱带入了其或向往或恐惧的边境那头,并因此受到本族文化不同程度的惩戒和拒斥。尽管最终她们都返回到边境这头,却依然在矛盾、困惑的边城徘徊不定。

将已故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经典作品和大陆当代女作家卫慧的极具争议性的文本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性阅读,这本身也是一种穿越时空、地域和种族界限的越境行动。虽然两个文本都是描述异国恋的女性自传体叙述,但一个是回忆殖民地时代生活的第一世界女性文本,另一个则是深受前者影响的后殖民地时期的第三世界女性书写。尽管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有着共同的受压迫经验,都是各自文化中的第二性,但殖民主义的历史经验、种族的差异却使她们在跨种族交往中呈现出异质的“第二性”特征。《情人》里的白种女孩爱上黄种男人被杜拉斯描绘为殖民者朝“下”的僭越,《上海宝贝》里的倪可和德国情人的性爱纠葛则被卫慧再现为被殖民者朝“上”的僭越。这两种相反方向的僭越恰好显示了种族因素在女性越境行动中所发挥的杠杆作用。女主人公种族身份的差别不仅导致了文本中不同的权力关系组合,还带来了大相径庭的阅读效果。通过对这些迥异的文本风景和读者反应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省察父权制度在建构和控制女性生活边境方面的操作手段,以及当今第三世界女性所面临的深刻困境。

一、“中国之音”:《情人》的结尾 和《上海宝贝》的开始

杜拉斯的《情人》是一部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女性书写有着深刻影响的西方文学“母本”。这个薄薄的中篇所描述的刻骨铭心的记忆、爱恨交织的家史、狂热而被禁止的欲望、对死亡的渴求和恐惧无疑都是足以跨越种族、文化差异的“永恒的人性”主题。它独特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点切换,现实与回忆交错的写作手法,跳跃、留白、回旋杂沓的叙事节奏,也为文本营造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古

典氛围。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示了女性表达本真个体经验、欲望和身体隐秘的叙事可能。^①

在小说的结尾,杜拉斯文本中的“我”再次变成了一个拉开了时空、心理距离的第三人称的“她”。白种女孩开始将她的想像固着在她的中国情人和他的中国妻子身上:想像那个中国情人如何面对那个白种女孩横陈在床的魅影,如何在他的“欲望的女皇”(白种女孩)的统治下反抗挣扎,如何通过“谎言”(对白种女孩的无法遏制的欲望)进入另一个中国女孩的身体,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使命。白种女孩甚至还在猜测那个20世纪30年代里的传统中国女孩是否知道她的丈夫和白种女孩的恋情,是否理解丈夫的痛楚,是否在洞房之夜为丈夫的哭泣而悲哀,是否通过眼泪和他达成了和解。尽管杜拉斯笔下分裂的主人公(“我”/“她”)承认自己对中国情人和他妻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其实一无所知,但却不愿放弃自己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的顶角位置。白种女人在其幻想空间中铺展开的殖民主义式的认知和控制欲望,最终通过中国情人多年之后的电话表白获得了证实。在电话中:“他的声音突然颤抖。随着这颤抖,猛然地,她重又听到了中国之音……接着他告诉她。告诉她像从前那样,他依然还爱着她,他永远不能停止爱她,他将爱她至死。”^②

但那个中国男人的颤抖声音果真代表了“中国之音”的全部?那个中国女人的声音哪里去了?为什么她只能是一个沉默的、逆来顺受的、以丈夫的悲哀为悲哀的幻影?那个中国女人有爱情吗?她爱的是谁?她的爱和不爱为什么相对于白种女孩的爱欲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为什么她只能是白种女孩和她的中国情人的生死恋情中被操纵的障碍和木偶?尽管卫慧的《上海宝贝》被方便地误读为后殖民时期“古老民族的悲哀寓言”,但好像还从未有人尝试把《情人》里的中国男人对白种女孩的疯狂迷恋和畏惧读作殖民时期的民族寓言。那个“在巴黎购买到了一切,他的女人、他的朋友、他的思想”的中国男人,那个把爱上一个白种女孩当作平生最大的英勇来炫耀的纨绔子弟,那个在更贫困的

① 宋学智、许钧:《〈情人〉的中国情结:杜拉斯与中国当代女作家》,《外语研究》2005年第2期,第67页。

② [法] Marguerite Duras, *The Lover*, trans. Barbara Bra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2, pp. 116-117. 本文所引用的杜拉斯原文均由笔者从《情人》的英译本译出。此处引用的小说结尾,英译为:“His voice suddenly trembled. And with the trembling, suddenly, she heard again the voice of China. He knew she'd begun writing books, he'd heard about it through her mother whom he'd met again in Saigon. And about her younger brother, and he'd been grieved for her. Then he didn't know what to say. And then he told her. Told her that it was as before, that he still loved her, he could never stop loving her, that he'd love her until death.”王道乾的中译本为:“他的声音突然颤动起来,而这一颤动,使她突然发现他那中国的口音。他说他知道她已经写过好多书,他是从她妈妈那里听来的,他曾经在西贡看见过她的妈妈。然后他她说出心里话,他说他和从前一样,仍然爱着她,说他永远无法扯断对她的爱,他将至死爱着她。”(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voice of China”和“中国的口音”之间的显著差异耐人寻味。

越南人面前是高贵的殖民者,在更高贵的法国殖民者面前却是卑贱的被殖民者的双面人,难道不也是一个东方古老帝国没落时期的尴尬写照?在以下的篇幅里,我将把《上海宝贝》读作是对《情人》的一个应答,一个中国女人对白种女人的故事的改写,一个中国女人对白种女人的书写主体地位的篡夺,其目的是要发出中国女性的声音,另一种“中国之音”。

《上海宝贝》里的倪可不再是《情人》里那个只会陪丈夫哭泣的中国女孩,她要做那个在写作中解放记忆、身体和自我的白种女孩。《上海宝贝》中每一章的西方“名人名言”题记可说是该理想的一个明白无误的表露。这是一个有多重功效的修辞手段。首先它是卫慧为读者设计的一个阅读参照系,希望引导读者在一个现当代西方文学/文化/文明的框架下阅读她的离经叛道的中国文本。但正是这种把“西方”当作防备文本误读的“疫苗”的心态,揭示出了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潜在风险。更糟糕的是,由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无法对那些西方名字的中文译名进行有效的辨认,导致疫苗的效力大为减弱,甚至引发读者民族主义的过敏。其次,被卫慧引用的不仅有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先锋派”艺术家,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和女性主义活动家:如艾瑞卡·琼(Eric Jong)、海伦·劳伦森(Helen Lawrenson)、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等,尽管她们在中国知识界的名气远远赶不上她引用的另外两名女性主义作家——普拉斯和杜拉斯。卫慧对于这些女性主义作家的征引显然表达了她对西方女性主义写作传统的自觉认同和效仿。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卫慧真诚的模仿所产生的效果却更像是滑稽的戏拟。这一点从中国读者对《情人》和《上海宝贝》两个文本的截然不同的反响中就可窥见一斑。虽然同是叙述跨种族性爱的自传性文本,前者被广泛赞誉当代西方的爱情经典,后者却被指责为投靠全球资本、趣味低下的媚俗之作,亟待连根铲除的文化“毒草”。^①让人不得不问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文化境况使一个来自第一世界的爱情悲剧脚本在移植进第三世界的语境之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遭人鄙夷的悲喜剧?难道文学也和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一样,必须经过悲剧和闹剧的两次轮回?为什么第一世界的女性作者能在主体“我”和客体“她”的分裂性叙事中辗转自如,安然无恙,而第三世界的女性作者却在第一人称“我”

的连续复述中精神分裂、自我崩溃(《上海宝贝》在“我是谁?”的反复拷问中结束)?第三世界评论者应该如何分析、梳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本之间巨大的效果反差?

二、《情人》:一个殖民地文本的“差异”话语

《情人》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支那、法属殖民地,历史上也曾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国、殖民地。主人公是一个家境贫寒的白种女孩,法国殖民者的女儿。和她发生关系的则是一个富有的中国男子,中国殖民者的独子。白种女孩的种族优势被其资本劣势(本文化中的中下层阶级)所制约,而后的资本优势(本文化中的上层阶级)则恰可以弥补他的种族劣势。白种女孩和她的中国情人的越境行为证明殖民时期的种族、阶级、性别的边界不是一堵绝对的柏林墙,而是一排漏洞不少的土篱笆。阶级的劣势迫使白种女孩(殖民者)进入了被殖民者的生活空间,成为土人汽车(native bus)上唯一的白种人。反之,阶级的特权却使得中国男人能留居巴黎,操一口造作的巴黎腔法语,挥金如土地混迹于法国人中间。当然,一个白种女孩像妓女一般委身于中国男人,接受他的馈赠,并且替家人敲他的竹杠,不会不遭到同族人的耻笑。但中国男人的金钱却足以部分填平种族的鸿沟。他送给白种女孩的昂贵钻戒,不仅让女孩的母亲为自己廉价的单粒宝石婚戒(solitaire)自嘲,而且令女孩学校的老师不再敢说三道四。归根结底,在父权社会中一个女人的价值只能用男人购买她的金钱来衡量。既然中国男人能比白种男人出更大的价钱购买白种女孩,赋予她更高的价值,女孩的家人除了无可奈何的恼怒和嫉妒,并不能有效地阻止这笔“交易”。

尽管白种女孩在经济上依附于中国男人,沿袭着传统的男主女从的性别模式,但在性爱关系中,却表现出明显的性别角色倒置。白种女孩自始至终如男人一般主宰着中国情人的欲望和情感。她那顶从不离身的男士呢帽是她被男性化的重要象征。她孩子气的身体和那顶男士呢帽的反差形成了白种女孩身上“关键性的暧昧”。^②中国情人的形象则被明显地女性化。他瘦弱的身体毫无男子气概,他在白种女孩面前经常紧张、恐惧和哭泣。中国情人的主要功能是像母亲一样奉献

^① 《上海宝贝》一经问世,就遭到了激烈批判。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朱大可的《上海:情欲在尖叫》和陆兴华著的《〈上海宝贝〉到西方及其它》。这两篇文章曾被多家网站转载,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② [澳] Anne-Marie (Cattan) Medcalf,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The Sense of Time and Place in Marguerite Duras’ *L’Amant*,” *Span* (36), 1993. <http://www.cc.murdoch.edu.au/ReadingRoom/literv/SPAN/36/Medcalf.html>.

给白种女孩无条件的爱和愉悦,弥补她母爱的缺失。因为白种女孩的母亲把全部的爱和生命给了她的头生子,并对其百依百顺,溺爱有加,但对于后面的两个孩子则不太关心。中国情人和白种女孩的“母子情深”直接反映在他和她身体上的近似。他欣然地发现他和她之间有“血缘关系”(kinship)。证据是:白种女孩的身体。多年的殖民地生活已经把白种女孩从身体,这个最基本的物质层面上,变成了一个印度支那女孩。她的皮肤不再是法国女人的粗糙,而是印度支那女孩经过雨水的洗浴、低脂肪食物的摄入和棉纺织物的包裹后所形成的柔和。他为她沉醉狂喜,他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像疼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疼爱嬉戏她的身体:“每晚他在她身上获取的愉悦已经吸走了他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生命。”^①

中国情人和白种女孩之间象征性的“母子”关系可谓是对种族、阶级、性别边界的彻底跨越。还有什么人类关系能比血缘的纽带更牢固?那么,为什么白种女孩和她的中国情人最终还是分手了呢?表面上看是因为中国情人的父亲的强力阻挠:他对白种人的厌恶和女孩家人对黄种人的歧视不相上下。但更隐秘的原因还是白种女孩自身无法跨越中西文化的隔阂。在堤岸,中国情人的住所,白种女孩对华人生活空间的拥挤和嘈杂有这样的描述:“城里的喧闹声很重,记得那就像一部声音开得过的电影,震耳欲聋……房间被城市持续不断的噪声包围着……木拖鞋的敲击声令人头大,人声尖锐刺耳,中国话是用叫喊的方式说的,我总是想像沙漠语言才是那样使用的,这是一种难以置信地陌生的语言。”^②不仅华人世界的声音和语言令她眩晕不适,华人世界的人群也同样让她厌恶反感:街上的华人群“像野狗那样肮脏,像乞丐那样盲目”。^③华人在人群中如同一个空洞的符号:没有欢乐,没有悲哀,没有好奇,只是无目的的随着人流行进。

显然,这里所刻画的华人社群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经验性事实,而只是白种女孩自身焦虑和恐惧的投射。她意识到华人社群是一个她无法了解和掌控的世界,一个能潜在地摧毁她的种族优势和文化权威的世界。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她只可能是一个“既孤单,又处于人群中,即便一个人也永远不孤单,即便在人群中也永

远孤单”的自相矛盾的边缘人。^④白种女孩对中国语言和社会结构的误解与她的高等殖民者身份,她所处的“权力的妄想狂位置”(the paranoid position of power)不无关系。巴巴认为“在殖民地话语中,他者的空间总是被一个固念所占据:暴君,异教徒,野蛮人,混沌,暴力”。^⑤这些象征暧昧地重复指示着殖民者权威的深刻危机。沉浸于东方主义话语所炮制的意象中的殖民者在跨越种族边界时,只可能如麦德考夫所说的“既挑战又参与东方主义话语”。^⑥尽管白种女孩因其家人对中国情人的精神虐待而感到愤怒、耻辱,但却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在她的大哥面前,中国情人不再是她的情人,不再是任何东西。她的欲望“服从”大哥,“拒斥”情人。^⑦最终她还是要求他把她“还给白人,她的兄弟们”。^⑧

三、《上海宝贝》:后殖民时代的种族奇幻

如果说《情人》里的白种女孩和中国情人还保持着“互补性”的差异,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上海宝贝》里倪可与德国情人马克之间的经济、性别、文化差异则被绝对化、正典化,并且显示出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西风压倒东风”的失衡景象。倪可所面对的种族边界已不再是一排稀松的土篱笆,也不是那面最终倒塌的柏林墙,而是那道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当作民族象征物而精心修复、广泛宣扬的万里长城。

为了认清种族的“长城”是如何修建的,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种族”概念的来历。“种族”的概念,即将人类根据肤色、毛发等身体特征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从中引申出其他“本质”特征(如智力、品行)的区别,其实是西方世界晚至19世纪的发明。无论在古代西方还是东方,这种对人群的划分方式都是不存在的。譬如《旧约》中虽然提到很多不同的族群名字,但他们和希伯来人的本质不同不是他们的体貌特征或性格,而是他们和耶和華的关系。^⑨反观中国古代文化,《礼记·王制第五》里虽有提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但这里的“性”并不是某种形而上的“人性”,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活习性,包括生产方式、生活工具、语言、食物、服饰等因素。《礼记》还

^{①②③④⑦⑧} [法] Marguerite Duras, *The Lover*, trans. Barbara Bra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2, pp. 98-99, 40-41, 46-47, 41, 52, 98.

^⑤ [美]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01.

^⑥ [澳] Anne-Marie (Cattan) Medcalf,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The Sense of Time and Place in Marguerite Duras’ *L’Amant*,” *Span* (36), 1993. <http://www.cc.murdoch.edu.au/ReadingRoom/literv/SPAN/36/Medcalf.html>.

^⑨ Kwame Anthony Appiah, “Race,”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s.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274-287.

相当宽容地提出对待不同的族群，执政者应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①种族的概念虽然本是西方殖民者将殖民统治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工具，但在近代中国，却被本土民族主义思想吸纳，演变为激发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喻说。直至今日，它还是构建我们民族认同的主要手段。比如，80年代初侯德建的一曲《龙的传人》就曾对“弘扬民族精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②

正是按照种族主义的逻辑，体貌的差异成了中国通过西方镜像辨认自我的原生点。“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不仅是一种民族自我指认，也是吸引西方白人目光的主要手段。倪可就曾辛辣地嘲讽过上海酒吧里“露着小蛮腰以一头东方瑰宝似地黑发作为招揽卖点的中国女人”。^③当然这些女人也包括倪可自己。因为在马克的心目中，她就是“长了一头垂至腰际的黑发和一双多愁善感眼睛的小才女”。^④马克看中的就是她的“东方人的身体，光滑，没洋女人那么多的毛，黄金般的颜色，油炸绸般的神秘。”^⑤

实际上，在和马克的跨国恋情中，倪可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种族意识。她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大肆讨伐着实有些冤枉。^⑥她其实也是民族主义战壕里的战友，和民族主义者分享着同一种意识形态资源。两者都把种族当作是确凿无疑的现实存在，而不是欲望制造的臆想和神话。《上海宝贝》的种族叙述里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对马克夫妇体貌的描绘。他们的身体被双双加工为中国人关于白种人刻板定型的范本。马克拥有白种男人典型的蓝眼睛，金黄的头发和体毛，狐臭，跷起的臀部和长得吓人的性器。伊娃除了美丽丰满外，还有白得耀眼的皮肤：“那种白色在阳光下有蜜汁的芬芳，使人有做梦般的感觉。”倪可还紧跟着比较了白种女人

和黄种女人的美：“白种女人的美可以沉掉千艘战帆（如特洛伊的海伦），黄种女人的美则是紧眉俏眼的，总是像从以往香艳时代的月份牌上走下来的（如林忆莲或巩俐）”。^⑦或许古代中国（前殖民地时期）那些和海伦一样“肤如凝脂”的美女们已经逐渐淡出了国人的记忆。而目前，许多两岸三地影视消费对殖民地时期女性形象的盲目复制也越发使我们丧失了另类的想象能力。^⑧

我的问题不是白种人到底是否具备上述的身体特征，而是为什么这样的身体特征汇聚在白种人身上能对中国人产生如此奇特的梦幻效果？为什么马克风中飘扬的金发代表着倪可的“异国情梦”？为什么面对伊娃的蜜汁般芬芳的白肤，倪可又有“做梦般的感觉”？这个奇特的通感是被怎样的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生产出来的？本是黄色的“蜜汁”是如何被“漂白”的？在这里，我想插叙一个叫萨拉·巴特曼（Sarah Bartman），绰号“霍腾图族的维纳斯”（The Hottentot Venus）的非洲女子的故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也代表了19世纪白种人的黑暗“情梦”。1809年，巴特曼被绑架到欧洲。在随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她被当作一个怪物在欧洲巡回展览，向大批欧洲公众展示她的“大得吓人”（请允许我重复倪可的用词）的臀部和阴道。在她死后，她的阴道和脑子被切下来，存放在巴黎的人类博物馆，继续供人观看，直到1974年才被撤下。^⑨为什么巴特曼曾经因为肥大的臀部而被当作劣等种族和黑人女性丑陋性欲的象征？为什么德国人马克现在又因为肥大的阳具而成为高等种族和白种男性超强性欲的象征？为什么前者在19世纪初的欧洲遭遇到非人的凌辱，后者却在20世纪末的中国受到异乎寻常的膜拜？这期间所彰显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幽灵难道

① 《礼记·上》，钱玄等注释，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178页。

② 参见陶东风：《警惕流行歌曲中的种族主义：从《蜗牛》等歌曲入选爱国主义歌曲说起》，《散文百家》2005年第10期，第10页。

③④⑤⑦ 卫慧：《卫慧精品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175、96、99页。

⑥ 陈龙和曾一果的《仪式抵抗：青年亚文化与“新人类文学”品格》一文将卫慧和棉棉归入到“新人类作家”，并抨击她们“变成了单纯的对于西方崇拜狂，从而失去了自己‘文化身份’——作为东方人的特征，所以她们的反叛声音变成了‘他者的声音’和‘他者的经验’——那些异域之声，她们都如卫慧一样希望失身于白种长毛的手中”（《文化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从这段不是特别通畅的中文里，不难看出民族主义身份政治走向极端之后的恶毒和荒谬。当这些男性评论者不遗余力地从西方搬运各种理论资源，用于自身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时，他们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声音变成了“异域之声”，不害怕“失神”（如果不是“失身”）于那些令人恐惧的“白种长毛”？他们“东方人”的文化身份难道就那么坚不可摧，抗变耐腐？为什么只有他们拥有周蕾所说的“暧昧的特权”？其实，西方和东方都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意识形态建构。它们的概念内涵也在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改变。西方从来就不是只有一个白种男性的声音（尽管这个声音曾经是主旋律），东方也绝不是、绝不应只有一个黄种男性的声音。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中国女性如何背叛了她们的文化、种族身份，而是剖析这种身份有着怎样的规范性内容，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是为了谁的利益，它对女性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⑧ 这里想起一段不无关联的趣闻。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汉朝贵族女性白脸、蚕眉、朱唇的造型被部分观众指责抄袭日本艺妓的装扮。制片人反击道：日本的艺妓才是抄袭俺汉唐的装扮。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美丽”对女性始终是一种社会规范和制约。从当代美丽标准的变迁中，我们或许可以揣测出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⑨ limbic, “Hottentot Venus’ Laid to Rest 200 Years After Her Abduction,” 2002, <http://www.kuro5hin.org/story/2002/7/26/103354/088>.

不值得我们深思?

倘若一个黑种男人拥有和马克一样的性器官,这个男人是否还会让倪可钦羡不已?恐怕不会,因为一个有关黑人男子的文化定型,从著名的奥赛罗开始,就是:性器发达,头脑简单。黑人男子是一个只知道性的野蛮人,和动物没有多大区别。但白种男人马克则不同,他既是一架精良的工作机器,同时又是一架完美的性欲机器,是“这个主流社会里堪称中流砥柱的男人”。这里的主流社会显然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马克不仅和他所代理的西方资本一样野心勃勃,富有进攻性,而且也像在全球市场无往不胜的西方资本一样在与女人的性关系中“如鱼得水”。他甚至被神话为海克里斯(Hercules)那般建立丰功伟业的资本英雄:“他身上的能力似乎是由宙斯赐予的”。^①显然,白种英雄/男神才是好莱坞梦幻工厂向第三世界输出的最成功的品牌,远比玛丽莲·梦露之流的性感女神更加激动人心。马克的言行能对倪可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和这个男神在一起,倪可也跟着进入了一个半人半神的超凡境界。譬如,当倪可来到浦东美国学校观看马克的足球比赛时,她就感到“这一所专向外籍子弟开放的贵族学校仿佛建立在云端,与凡俗生活的浮尘隔离”。^②

四、越境的代价

《上海宝贝》所再现的白种神话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文化根源。这里我不想对这个神话的成因进行探讨,只想借用华裔美国学者周蕾的理论思考来对比《情人》里的白种女孩和《上海宝贝》里的倪可在跨越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多重边境时所付出的不同代价。女性的越境行动总是充满危险的。由于它直接威胁到父权制度的稳定,又总是遭到严厉的惩罚。对兼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双重身份的女性殖民者是如此,对处于全球资本金字塔底层的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女性则尤甚。因为后者不仅遭遇来自族群外部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还要忍受族群内部的性别剥削。

周蕾在批判法农(Fanon)对殖民地女性所作的精神分析时认为,黑人男性被法农同情地描绘为众多力量的受害者:殖民主义,他自身对历史的痛苦情感回应,甚至包括“他”女人的不忠和“白种性”。而有色人

种女性则遭到法农的严厉诋毁。在法农眼里,每一个黑种女人都欲望着白种情人,期盼借着性关系从白人世界中捞到好处。黑种女人要么是黑人叛徒(选择高等的白种男人,做着向上爬的梦想),要么就是“白种女人”(选择低等的黑种男人,怀抱和白种女人一样渴望被强奸的性幻想)。周蕾提出黑人男性一直享有“暧昧的特权”(privilege of ambivalence),即他们不必在白色和黑色之间做出选择,可以在族群和精神上都处于摇摆不定的临界状态,自由地出入社群和白种女人交欢,而不会有人质疑他们的族群身份。但黑种女人则被要求严格地呆在种族的边界之内,任何跨越族裔的行为都会遭到排斥、惩罚、甚至被逐出黑人社群。^③

《情人》里的白种女孩和《上海宝贝》里的倪可貌似相同、实则完全不同的跨种族经验恰好证明了周蕾的分析。表面上白种女孩和倪可都是各自族群的叛逆者,同样被视作妓女(白种女孩被中国情人的父亲斥为“白种小娼妇”),同样依靠异族男人获取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但杜拉斯的白种女孩却颇有些黑种男人“暧昧的特权”。即便她爱上一个黄种男人,她也不必在白种人和黄种人中做出选择。尽管她被视作“白种小娼妇”,但她首先还是“白种”的。尽管她的身体和有色人种女孩的身体几乎没有差别,但她的精神、她的语言、她的教养依然是彻底白种的。她可以安全地出入有色人种的生活空间而不必担心她的白种身份遭到质疑。她母亲对她歇斯底里的打骂其实是一个强烈的“你是我们的一员”的信号,是在加固、而不是动摇她的白种身份。更重要的是,她对中国情人和他的种族背景的兴趣从来没有超越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居高临下的好奇和偏见。她轻易地看穿了他的一切,他的优雅、感性、懦弱、放荡和浅薄(他其实是个和她大哥一样的败家子,只不过没有后者那么凶残邪恶)。而他对她却毫不了解。她“知道他不理解她,永远不会理解她,他缺乏理解如此异常的力量。”^④她的“知道”相对于他的“不知道”显然更加深化了她的白种身份的关键内涵——主宰的权力。

法农为殖民地时期的黑人女性所预备的两种选择:黑人叛徒和“白种女人”,对于后殖民地时期的第三世界女人倪可却都已经不是出路。她坚定的西方个人主义信念使她不能选择天和“伪基督徒”那样依赖谎言和传统性别霸权的中国男人。但她的第三世界女性

①② 卫慧:《卫慧精品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32、99页。

③ [美]Rey Chow,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 Culture, Ethnicity,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5-73.

④ [法] Marguerite Duras, *The Lover*, trans. Barbara Bra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2, p. 37.

身份也令她高攀不了马可那样的“主流”白种男人,因为他们早已经有了白种妻子,不会为第三世界女人放弃自己安逸熟悉的家庭生活。此外,异性恋模式下的白种女人也会对黄种女人严加防范:“外国女人看自己同胞带来的中国情妇的眼光总是很微妙,有点像看一个入侵者,……她们一般不喜欢中国男人,可无数中国女人又跟她们争洋男人。”^①结果,倪可只能以不安全、不合法的情人身份,徘徊在中国男人和西方男人之间。一方面和天天保持纯情的精神恋爱,一方面又和马克维持性爱的游戏,以这种虚假的精神和肉体的二元对立掩盖更深刻的种族和性别的困境。倪可对马克的两次蓄意打劫(一次偷了他钱包里的钱,在马克飞离上海前夕又偷走了他的铂金婚戒)正是她对造成其身份困境的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的潜意识反抗和报复。倪可虽然是马克的情人,却只能靠偷窃,获得一枚《情人》里的白种女孩所拥有的昂贵戒指(马克走时,只留给了她一堆“爱的垃圾”);她虽然不是妓女,却被西方情人当作满足性幻想的免费物件,不负责任地滥用;她虽然不是一个为了出国不择手段“钓洋龟”的“贱”女人,但却和那些女人一样因为受到白种男人的青睐而自命不凡。

倪可既做不了白种女人,也做不了黄种叛徒。她只能是一个不彻底的“香蕉人”,在文字中时不时地爆发出一种惊人尖锐的,夹杂着自豪、羞耻、自在、不安等一系列混杂情感的种族意识。即便是她视作拯救的写作,也不能带给她自信和尊重。“教父”等本土书商包

含着性引诱的恭维并不能打动她,而马克引荐的德国记者的采访也依然令她有做秀的怀疑。她努力通过写作打破沉默,打破隐形状态,证明自身的存在。她每天都在幻想“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②但为了快速到达那个显眼的位置,她就必须把自己呈现为一个供西方他者凝视的东方主义客体。如同兴国宾馆前的那个草地派对,如果倪可不想被美菱银行总裁的太太当作吵闹的入侵者赶走,就必须有一个同样住在那所豪宅里的西方男人愿意“一直盯着”她看。

《上海宝贝》对《情人》的改写不可能圆满,因为第三世界女性永远不可能获得第一世界女性的主体位置。当代中国女性注定要生活在边界,生活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之中,狂乱地往返于“父权制度和帝国主义,主体构成和客体形成之间”,承受着资本主义全球化为第三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和混乱。^③在灰色暧昧的边境地带,她们茫然不安,无所适从,忍受着自我被撕裂的焦灼和伤痛。但她们也都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跨越边境,并从越境行动中学习到新的语言、新的视角和新的自我表达方式。从杜拉斯的《情人》到卫慧的《上海宝贝》,不难看出,中国女性的声音还很微弱,很含糊。但至少她们已经不再沉默。

责任编辑:项义华

①② 卫慧:《卫慧精品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52、1页。

③ 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Speculations on Widow - Sacrificing,” *Wedge* (7/8), 1985, p. 368.